

# 聶華苓《桑青與桃紅》在台港傳播現象 及其版本演繹

——以發表於《聯合報·副刊》和《明報月刊》者為例\*

王鈺婷

清華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教授

## 摘要

本文關注 1970 年代聶華苓作品在台港傳播、演繹，以梳理其中文本政治。聶華苓《桑青與桃紅》於 1971 年連載期間因為「政治敏感」而遭到腰斬至 1987 年台灣解嚴前後，這十多年間聶華苓與台灣文壇絕緣，聶華苓作品除了在中國大陸出版，其主要發表的場域是香港，此一時期香港成為傳播聶華苓作品的重要平台。《桑青與桃紅》於 1970 年 12 月 1 日於《聯合報·副刊》和香港《明報月刊》第 5 卷 12 期同步連載，隔年 2 月 6 日《聯合報·副刊》禁止刊行，《桑青與桃紅》至 1972 年 4 月於《明報月刊》第 7 卷 4 期刊畢。本文透過重返 1970 年代台灣與香港文學場域，詮釋聶華苓《桑青與桃紅》在台港的傳播過程以及其中版本的演繹，以分析《桑青與桃紅》在國共對峙與冷戰政治漩渦影響下於台港發表時期，其版本差異如何反映海峽兩岸政治局勢，並與文化思潮與歷史地理進行互動。

關鍵詞：聶華苓、《桑青與桃紅》、《聯合報·副刊》、《明報月刊》、跨區域傳播

---

\* 本文為 109 年度科技部專題計畫「女性離散文學與香港發表場域——以 1970 至 80 年代聶華苓作品在香港傳播路徑與文學流轉為考察對象」（108-2410-H-007-072-）部分成果，感謝投稿期間審查委員惠賜寶貴意見，並感謝清華大學台灣文學所博士候選人吳文協助資料蒐集與彙整。

# Taiwan and Hong Kong:

The *United Daily News* Supplement and *Mingpao Monthly* Editions as  
Examples

---

**Wang Yu-Ting**

Professor  
Institute of Taiwan Literature  
National Tsing Hua University

## Abstract

This article focuses on the dissemin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Nieh Hualing's work in Taiwan and Hong Kong in the 1970s in order to sort out the textual politics behind these processes. Owing to "political sensitivity," the serial publication of Nieh Hualing's *Mulberry and Peach* in 1971 was halted until after the lifting of Taiwan's martial law in 1987. Thus, for over a decade Nieh had no contact with literary circles in Taiwan. Aside from being published in China, her works were mainly published in Hong Kong, which became an important platform for the dissemination of Nieh's works during this period. The serial publication of *Mulberry and Peach* started in December 1970 in both Taiwan's *United Daily News* supplement and Vol. 5, No. 12 of Hong Kong's *Mingpao Monthly*. On February 6th of the following year, the novel was banned from publication in the *United Daily News* supplement, while the *Mingpao Monthly* finished publishing the novel in Vol. 7, No. 4 in April 1972. By re-examining the literary fields of Taiwan and Hong Kong in the 1970s,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dissemination of Nieh Hualing's work *Mulberry and Peach* in Taiwan and Hong Kong, as well as textual differences found across later editions, in order to explain how *Mulberry and Peach*—a work that possess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both diasporic and women's literature— broaches a variety of topics related to cross-regional dissemination and geopolitics within the political vortex of the KMT–CCP standoff and the global Cold War, thus reflecting the political changes taking place in Taiwan, Hong Kong, and China at the time.

**Keywords:** Nieh Hualing, *Mulberry and Peach*, *United Daily News Supplement*, *Mingpao Monthly*, Cross-regional Dissemination





# 聶華苓《桑青與桃紅》在台港傳播現象 及其版本演繹

——以發表於《聯合報·副刊》和《明報月刊》者為例

## 一、前言

1986年葉石濤於《民眾日報》發表〈聶華苓的復活〉，文章開頭談到1964年離開台灣去美國的聶華苓在去國二十多年間，其作品與台灣文壇的「絕緣」，葉石濤提到的絕緣，並非指聶華苓和台灣文學脫節或是隔閡之意，而是指這二十多年來，中國大陸陸續出版許多聶華苓的小說，如《失去的金鈴子》、《桑青與桃紅》、《台灣軼事》等作品，可是聶華苓的作品在台灣已經絕跡，而在1986年9月這一兩個月又在台灣某報看到聶華苓的作品，葉石濤詮釋出聶華苓此一流亡作家深入的故事。<sup>1</sup>葉石濤的歷史回憶，輻射出聶華苓本身傳奇的經歷，與其作品出版背後敏感的政治議題。關於聶華苓在台灣發表的曲折歷程，范銘如在論述《桑青與桃紅》也發出喟嘆，她提到虛構世界裡的桃紅可以跨界、踰矩，而現實世界的文本卻無法逃開家的管束，提到：「《桑青與桃紅》最後以經典的榮銜重回中文出版界，帝女雀的絕地復仇終於成功：可嘆的是，少小離家老大回，荏苒近二十年光陰。」<sup>2</sup>然而《桑青與桃紅》荏苒近二十年光陰必須由何處尋回呢？

范銘如所指的《桑青與桃紅》荏苒近二十年光陰，應是指《桑青與桃紅》於七〇年代初次問世，連載於《聯合報·副刊》而後遭到腰斬，此一期間聶華苓和夫婿愛荷華國際寫作班主任 Paul Engal 於1972年合譯毛澤東詩選結集出版，

1 葉石濤，〈聶華苓的復活〉，《民眾日報》，1986.09.29，11版。

2 范銘如，〈來來來，去去去——六、七〇年代海外女性小說〉，《眾裏尋她——台灣女性小說縱論》（台北：麥田出版社，2008.08），頁144。

而被國民黨政府列入黑名單，禁止入境，1988年隨著聶華苓獲准返台，其中《桑青與桃紅》歷經輾長的過程，終於在台正式出版。<sup>3</sup> 聶華苓曾用「二十幾年了，這小說竟陰魂不散、到處流浪」<sup>4</sup> 以及「這小說東兜西轉、歷經滄桑」<sup>5</sup> 來說明小說歷經流放、頗為艱辛的出版歷程。

《桑青與桃紅》中聶華苓透過桑青與桃紅的精神分裂，來辯證出女性主體與家國認同之間複雜的關係，也是深受自由主義薰陶的聶華苓自主性格之展現。1949年加入《自由中國》編輯委員會的聶華苓，在編輯《自由中國》文藝欄不應和當時反共八股，展現出女性主體位置；1960年因為雷震案受到牽連，與外界隔離一年，以及其後她所創作《桑青與桃紅》被腰斬背後政治性之因素。《桑青與桃紅》此一小說中文出版史歷經滄桑，如同聶華苓自言「反應了海峽兩岸的政治風雲變化」，<sup>6</sup> 聶華苓直言「兩岸出版那一刻的政治氣候」為決定版本命運的關鍵因素：「『人』不要政治，政治偏要纏他，擾他，整死他。是在臺灣、大陸、香港出版的第七個版本——有大刀砍亂的版本，有小刀修剪的版本，有一字不漏的全本。在兩岸出版那一刻的政治氣候決定版本的命運。」<sup>7</sup> 《桑青與桃紅》出版歷經香港友聯出版社（1976）、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1980）、香港華漢文化公司（1986）、台北漢藝色研文化公司（1988）、瀋陽春風文藝出版社（1990）、北京華夏出版社（1996），而迄第7個版本為台北之時報文化出版社（1997），直至2020年時報又推出新世紀珍藏版。《桑青與桃紅》英文版分別由美國與英國出版、並於1990年獲得美國書卷獎的榮譽，其經典性地位儼然形成，成為亞美文學的指標之一。晚近評論界從女性主義、少數族裔作品等角度對於聶華苓之

3 王鈺婷，〈〈千山外，水長流〉之主題意涵與傳播現象——以發表於《明報月刊》者為考察對象〉，蘇費翔、簡若珮主編，《異口同「聲」——探索臺灣現代文學創作的多元發展》（台北：秀威資訊科技公司，2022.05），頁307。

4 聶華苓，〈桑青與桃紅流放小記〉，《桑青與桃紅》（台北：時報文化出版公司，1997.05），頁272。

5 同註4，頁272。

6 同註4，頁271。

7 同註4，頁271。

作品進行評價，如同梁一萍指出《桑青與桃紅》其多重論述位置，也使其成為「易位跨界」的文學。<sup>8</sup>《桑青與桃紅》歷經政治風雲與文學典律的變化，直到九〇年代才在「臺灣」與「亞美文壇」兩大文學世譜中得到認可，成為「易位跨界」的文學。在《桑青與桃紅》成為「易位跨界」的文學之前，這部「東兜西轉、歷經滄桑」的小說出版史，頗值得探究。

白先勇曾論述《桑青與桃紅》崎嶇的出版過程，白先勇指出：「1971年在台灣報上連載時，遭到腰斬的命運，據說因為政治原因，後來這本書在中國大陸出版時，只蒐集了前三章，第四章卻被刪去，因為這一部分太『黃』，八〇年代初，大陸的出版尺度吃不消，《桑青與桃紅》可說是本相當惹事的書，左右不逢源。」<sup>9</sup>聶華苓《桑青與桃紅》於1971年連載期間因為「政治敏感」而遭到腰斬，至1987年台灣解嚴前後，這十多年間聶華苓與台灣文壇絕緣，其作品除了在中國大陸出版，其主要發表的場域是香港，此一時期香港成為傳播聶華苓作品的重要平台。<sup>10</sup>其中《桑青與桃紅》於台港發表現象頗值得關注，《桑青與桃紅》於1970年12月1日開始於《聯合報·副刊》進行連載，至隔年2月6日禁止刊行，計刊載56期，與《聯合報·副刊》同一時期，《桑青與桃紅》由1970年12月於香港《明報月刊》5卷12期至1972年4月該刊7卷4期進行連載，全文完整刊載。本文透過重返1970年代台灣與香港文學場域，詮釋聶華苓作品《桑青與桃紅》在台港發表的傳播過程以及其中版本的差異，以梳理《桑青與桃紅》發表時複雜的歷史源流，特別是在國共對峙與全球冷戰的政治漩渦中，聶華苓具備離

8 梁一萍提出：「《桑青與桃紅》在一九九七年『回到初生的地方『臺灣』』，又在同年『歸宗』亞美文壇，在兩個文學世譜得到認可，與其說《桑青》流放，不如言『易位跨界』、來去自如。」見梁一萍，〈女性／地圖／帝國：聶華苓、綢仔絲、玳咪圖文跨界〉，《中外文學》27卷5期（1998.10），頁72。

9 白先勇，〈世紀性的漂泊者〉，《九十年代》239期（1989.12），頁94。

10 1970至80年代，聶華苓在香港出版四部作品，包括兩部長篇小說《桑青與桃紅》（1976，友聯出版社），《千山外，水長流》（1985，三聯書店）；短篇小說集《王大年的幾件喜事》（1980，海洋文藝雜誌社）；散文集《黑色，黑色，最美麗的顏色》（1983，三聯書店）。聶華苓也於香港報章雜誌發表為數可觀的作品，發表媒介包括《南北極》、《明報月刊》、《海洋文藝》與《七十年代》（後改名為《九十年代》）。見王鈺婷，〈〈千山外，水長流〉之主題意涵與傳播現象——以發表於《明報月刊》者為考察對象〉，蘇費翔、簡若珮主編，《異口同「聲」——探索臺灣現代文學創作的多元發展》，頁304。

散文學與女性文學特質之作品，在台港發表時期如何反映海峽兩岸政治的局勢，並與文化思潮與歷史地理進行互動。

## 二、《桑青與桃紅》在台港傳播版本之變遷——以小說的楔子為例

應鳳凰曾說明《桑青與桃紅》一書版本的變遷，陳述《桑青與桃紅》被停刊到呈現完整風貌的過程：「聯副主編是同時經營皇冠雜誌的平鑫濤，積極爭取小說到『聯合副刊』連載。想不到才刊登一半便硬生生給腰斬，主編再三致歉。此時香港《明報月刊》張開歡迎的手臂：台灣不能刊，我們能。桑書於是在香港雜誌首次全文完整刊載。」<sup>11</sup> 值得注意的是《桑青與桃紅》並非被禁之後才轉到香港《明報月刊》刊登，而是於 1970 年 12 月同步於《明報月刊》5 卷 12 期連載至 1972 年 4 月《明報月刊》7 卷 4 期刊畢。1963 年林海音由於「船長事件」被迫辭去在任十年的《聯合報·副刊》主編之職，平鑫濤主編《聯合報·副刊》時，《桑青與桃紅》因故被迫腰斬，是另一個值得研究的課題。平鑫濤曾在接受楊明的訪問，提到回憶此事由於年代久遠，有些細節記不太清楚，就記憶所及：「這篇小說之所以被停，並不像外界所揣測的是政治方面的因素，而是因為聶華苓用詞之大膽，引起當時部分衛道人士的反彈。」<sup>12</sup> 平鑫濤提出當時道德標準嚴苛是影響《桑青與桃紅》停刊之因，並補述當年決定刊登《桑青與桃紅》本來就是一個大膽的決定。<sup>13</sup>

《桑青與桃紅》於 1970 年 12 月 1 日於《聯合報·副刊》進行連載，至隔年 2 月 6 日禁止刊行，計連載 56 期。小說「第一部」是從 1970 年 12 月 1 日連載到 1970 年 12 月 31 日，為每日刊登；小說「第二部」從 1970 年 12 月 31 日每日連載至 1971 年 1 月 22 日，但是從 1971 年 1 月 22 日編號 53 後，中斷數日，

11 應鳳凰，〈聶華苓小說《桑青與桃紅》〉，《印刻文學生活誌》7 卷 9 期（2011.05），頁 191。

12 楊明，〈聶華苓《桑青與桃紅》七〇年代被副刊腰斬的小說〉，《中央月刊文訊別冊》6 期（1997.12），頁 32。

13 同註 12。

編號 54、55、56 分別在 2 月的 4、5、6 日連載，至第二部「桃紅給移民局的第二封信」刊完，即停止連載。《桑青與桃紅》連載楔子之初，副刊版面即刊出：「『桑青與桃紅』是名作家聶華苓女士旅美多年，所完成惟一長篇小說，不論在意境上、在寫作技巧上、在故事的結構上，都到達一個簇新的境界，我們很榮幸地今日起隆重推出連載。全書將近二十萬字，為了使讀者對全書有一個概念起見，除今天把楔子一次刊完外，特將全書的目錄，予以刊介如后：」<sup>14</sup> 其中作品的目錄，包括：楔子、第一部「桑青日記——瞿塘峽（1945 年 7 月 27 日～8 月 10 日）桃紅給移民局的第一封信」、第二部「桑青日記——圍城北平（1948 年 12 月～1949 年 3 月）桃紅給移民局的第二封信」、第三部「桑青日記——台北閣樓（1957 年夏～1959 年夏）桃紅給移民局的第三封信」、第四部「桑青日記——美國獨樹鎮（1969 年 7 月～1970 年元月）桃紅給移民局的第四封信」、跋<sup>15</sup>，然而目前所見《聯合報·副刊》僅刊登楔子、抗戰勝利前夕的瞿塘峽，及「桃紅給移民局的第二封信」，而其後《桑青與桃紅》所刻劃之「桑青日記」（北平·1948 年 12 月～1949 年 3 月）和共產黨進入北京圍城的部分，由於涉及共產黨入城與解放軍的情況，部分被刪減。

本文比對在《明報月刊》上完整刊出的《桑青與桃紅》，《聯合報·副刊》的版本其刪改的部分，可以看到國民黨政府的思想箝制與反共政策的影響，其中值得注意的是楔子中由桑青蛻變成為漂泊在美國的桃紅於牆上塗寫的一些字，在《明報月刊》上完整的保留：

花非花

我即花

霧非霧

14 〈關於桑青與桃紅〉，《聯合報·副刊》，1970.12.01，9 版。

15 同註 14。

我即霧  
我即萬物

女生鬚  
男生子  
天下太平矣

頭生腿間  
陰部生頸上  
正常的人

誰怕蔣介石  
誰怕毛澤東  
Who is afraid of Virginia Woolf  
桑青弑父弑母弑夫殺女

柯寧斯無線電工廠  
警告牌

小心安全第一  
超過此處必須戴眼罩  
不要跑不要隨便動手  
急診處  
工作遊樂無論何處無論何時安全第一  
電動鏡子電動梳子電動牙刷電動  
腦電動人電動風電動太陽電動  
月亮電動接吻電動性交電動上帝



電動聖母電動電動電動電動

電動生殖器

一個女人於獨樹鎮

單車道開車肇事

原因不詳

姓名不詳<sup>16</sup>

小說楔子透過刑天舞干戚的神話連結到「桑青千古」的影像，以對抗炎帝被斬首卻依舊奮戰的刑天，來對比桑青死後桃紅誕生的歷程，聶華苓以刑天對抗君權的一面來連結桃紅反制父權的議題，<sup>17</sup>有其匠心獨具的藝術架構。牆上塗寫的文字，和小說題旨有深刻的連結，在此可以看到聶華苓如何透過這些文字去塑造桃紅的女性意識與心理轉折，從「女生鬚／男生子／天下太平矣」與「頭生腿間／陰部生頸上／正常的人」可以看到此一詮釋所具有的解構性，前者解構了男女性別形象的刻板窠臼；後者則翻轉以陰部為下位的思考，並提問何謂正常人的定義，並以此詮釋出性欲浪女桃紅的特質；<sup>18</sup>而「桑青弑父弑母弑夫殺女」則是呈現出桑青對於社會倫理的排拒，並以此連結出文本脈絡中桑青在「玉避邪」的爭奪及其與重男輕女的父親之關係，和後母的敵對與夫婿沈家綱和女兒桑娃的複雜情感。<sup>19</sup>

延續上述顛覆父權社會的姿態，「誰怕蔣介石／誰怕毛澤東／Who is afraid

16 聶華苓，〈桑青與桃紅（一）〉，《明報月刊》5卷12期（1970.12），頁92。

17 曾珍珍提及聶華苓拿對抗天帝被斬首的刑天與不認命的桑青／桃紅作類比，以凸顯女人身體反制父權的顛覆能量。曾珍珍，〈《桑青與桃紅》：七十年代的前衛女性身體書寫〉，《文學台灣》37期（2001.01），頁65。

18 關於這首詩此一段落陳佳姣提出幾種解讀方法，從反諷、解構主義與性別的方式提出詮釋，見陳佳姣，〈論《桑青與桃紅》中的女性意識與歷史書寫〉，《中文研究學報》3期（2000.06），頁150-151。

19 關於玉避邪的象徵，黃儀冠有提出細膩的文本詮釋，見黃儀冠，〈鄉關何處——論《桑青與桃紅》的陰性書寫與離散文化〉，《政大中文學報》1期（2004.06），頁276-281。

of Virginia Woolf」這一組句子的指涉意義，點出桃紅對於政治議題的思考。對於蔣介石與毛澤東所代表政治上左右翼之爭，桃紅所抱持疏離挑釁的姿態，白先勇直指此一標題如同《紅樓夢》開場詩一般，點全書的重要主旨，白先勇認為：「但那標語卻包含了全篇小說所要指出的事實：毛和蔣不用說在政治理論上各執一端，成為近代中國分裂之源，這半個世紀的政治理論鬥爭，撕裂了中國人的內心，令他精神破碎，精力頹竭，無路可退，只好躲進荒謬者的世界，也只有在那裡，政治教條才失去意義。」<sup>20</sup> 在此白先勇從中國文學流亡傳統來評論此書如何具象化二十世紀中國人的因避秦亂、浪跡天涯的過程，然而對於性別的層面，白先勇並未多做詮釋，特別是「Who is afraid of Virginia Woolf」此一句話對於性別議題的探索。「Who is afraid of Virginia Woolf」延續桃紅對於政治上左或是右的解構，也重申對於性別議題的解構，在此提出一個不受性別意識所束縛的人如何回應 Virginia Woolf（吳爾芙）此一奇特而難懂的作家，也進一步挑戰傳統批評中對於吳爾芙作品的詮釋框架。

這也令我們聯想起莫以（Toril Moi）和肖維特（Elaine Showalter）兩位評論家對於吳爾芙作品詮釋的歧異，莫以認為肖維特對於吳爾芙作品的分析是傳統人文主義式的，偏向於人文主義統合的概念，以至於無法正視吳爾芙雌雄同體書寫方式所具有的激進解構性，莫以提到：「肖維特希望文學文本能夠給予讀者相當的安全感、穩固的觀點，使其可以從而批評世界。吳爾芙，在另一方面，似乎運用現時我們可能稱為『解構性』形式寫作，企圖對付而因此暴露論述之二重性本質。」<sup>21</sup> 莫以認為吳爾芙現代主義的書寫方式，以雌雄同體的理論，否定性別本質論，並創造更多可能性，在此莫以與肖維特分別代表法國與英美女性主義評論者的立場。

20 原刊於白先勇，〈世紀性的漂泊者〉，《九十年代》239期，頁94。見白先勇，〈世紀性的漂泊者——重讀《桑青與桃紅》〉，《桑青與桃紅》（台北：時報文化出版公司，2020.02），頁325。

21 Toril Moi（托里·莫以）著，陳潔詩譯，《性別／文本政治：女性主義文學理論》（台北：駱駝出版社，1995.06），頁5。

身為二十世紀最特異的女作家之一的吳爾芙，她探討雄雌同體性別想像的名作《歐蘭朵》已成為女性主義的經典之作，張小虹認為吳爾芙「在小說創作方面，專擅以神秘主義之色彩，意識流之手法，探索人物內在幽暗隱晦的心靈糾結」<sup>22</sup> 聶華苓藉由「Who is afraid of Virginia Woolf」，連結「誰怕蔣介石／誰怕毛澤東」的文句脈絡，也令我們聯想起吳爾芙從性別觀點表達對於父權國家的看法，吳爾芙提到戰爭是為了滿足男性的好戰本能，她的名言是作為一個「外人」，我沒有國家，在此表達出吳爾芙反戰的觀點，與作為一個女人的吳爾芙與家國格格不入之處。而作為一個女人的桃紅呢？桃紅在漫長生命的流徙中最終流亡美國，她跨越地理的疆界，是否可以跨越父權家國／疆界呢？桃紅的生命也和上述家國的議題對話，和吳爾芙思考性別與國家的關係此一邏輯亦是相通，如同梁一萍提到桃紅「永遠在路上」的遊走策略，逃脫家庭與政治的束縛，「遂能打破男性在知識、權力、視權、輿圖再現等層面的掌握，撕裂方格座標，走出地圖疆界。」<sup>23</sup> 周芬伶探究女性與地圖／帝國之間幽微複雜的關係，認為倒寫與粉碎都深具顛覆性：「這裡女生鬚，男生子，顛倒性別，即顛覆帝國，撕破地圖的動作。桃紅在帝國的 center，一次又一次被撕裂，一次又一次被驅逐，當她退到無可退時只有反擊，扭轉乾坤，倒寫帝國，粉碎地圖……」<sup>24</sup> 「Who is afraid of Virginia Woolf」象徵聶華苓在桃紅身上所寄託的性別態度，也可以看到聶華苓創作的企圖。

這段提領全書主旨的開場詩，可以說是聶華苓從多重角度回應本書的主題，包括桃紅對於工業文明至上的疏離態度，對於腦、人、接吻、性交、生殖器都電動化，甚至連上帝與聖母都可以電動化的現象，加以調侃，並附上「警告牌」與

22 張小虹，〈《歐蘭朵》：文字／影像互動與性別／文本政治〉，《中外文學》23卷6期（1994.11），頁74。

23 梁一萍，〈女性／地圖／帝國：聶華苓、綢仔絲、玳咪圖文跨界〉，《中外文學》27卷5期，頁87。

24 周芬伶，〈移民女作家的困與逃——張愛玲〈浮花浪蕊〉與聶華苓《桑青與桃紅》的離散書寫與空間隱喻〉，《台灣文學研究學報》2期（2006.04），頁13。

「小心安全第一」的警告標語，這是桃紅對於工業文明異化現象的批判。<sup>25</sup> 開場詩的結尾「一女人於獨樹鎮／單車道開車肇事／原因不詳／姓名不詳」也是回應小說情節中桑青與小鄧的車禍報導，宣告了桑青之死。

相較於《明報月刊》上完整保留桃紅塗寫的文字，《聯合報·副刊》的版本，則是刪除了「誰怕蔣介石／誰怕毛澤東／Who is afraid of Virginia Woolf」這一組句子，某種程度上剝落了聶華苓作品中對於民族認同、國家權力與性別主體的宣告態度。以下將焦點轉回《聯合報·副刊》上《桑青與桃紅》刪改版，與《明報月刊》上完整版相互比較，並藉此思考聶華苓《桑青與桃紅》所遭逢台灣戒嚴體制的政治環境下文化生產機制。

### 三、文本／政治：論《聯合報·副刊》刪改版本

比對《聯合報·副刊》刪改版與《明報月刊》上完整版，可以看到國民黨反共文藝政策，從五〇年代戰鬥文藝運動與文化清潔運動以來，對於文藝政策的一貫立場，一直延續到七〇年代鄉土文學時期。《聯合報·副刊》所刪改的版本中，可從主題、題材、意識形態與語辭用字的規範，與政治性要求的層面一一探討，其中刪改部分，大致有六大面向，其一對於涉及國民黨政府治理情形的描述；其二為對於蔣介石和毛澤東等政治敏感用詞的處理；其三為涉及到正面書寫共產黨形象和直接描寫共產黨的口號、活動的呈現；其四為牽涉到共產黨順利進入北京圍城事實之描述；其五為對於傳統文化與道統的描述；其六為對於情色部分之處理，以下闡述。

其一涉及國民黨政府治理情形的描述，如桑青日記在抗日時期於四川瞿塘峽的場景，刻劃出少女桑青與好友乘坐木船，經過瞿塘峽逃到大後方重慶，在日本戰機的轟炸聲中，與一群萍水相逢的人困在擱淺之船上，他們無視於戰亂，跳舞、扶乩、賭博、玩樂，呈現出政局變動下人在極端情境下難以自保，只能一逕尋歡

---

25 陳佳姣，〈論《桑青與桃紅》中的女性意識與歷史書寫〉，《中文研究學報》3期，頁152。

作樂。其中一段提到流亡學生感嘆上有日本飛機，下有瞿塘峽，人死船翻，都沒有人管，簡直把人命當兒戲，老先生回覆說：「我不懂你的話，誰把人命當兒戲呀！」流亡學生回答：「誰？政府呀！」，以及老先生回應：「幾千年了，三峽就是這麼個險法，政府又有甚麼辦法呢？」，這一段在《聯合報·副刊》上予以刪除。<sup>26</sup> 流亡學生與老先生的話分別代表知識分子與一般老百姓面臨到此一處境的雙重態度，流亡學生提到政府的責任，與老先生提到不能將一切寄託於國家的想法，在此《聯合報·副刊》上予以刪減。

此外，描述抗戰勝利後，桑青由南京往已經被共產黨包圍的北平圍城與沈家綱重聚，桑青日記寫到：「南京挪在白雲下面了：罷工、搶購、搶米、停課、示威遊行、流血暴動、政治鬥爭……」，其中「政治鬥爭」四個字在《聯合報·副刊》上予以刪除，<sup>27</sup> 此一刪除是否因為涉及到當時國民黨統治南京的政治情況，以及牽涉到揭露抗戰勝利後國共兩黨的糾葛與權力鬥爭而予以刪除，值得思考。

其二是為對於蔣介石和毛澤東等政治敏感用詞的處理。如在瞿塘峽攔淺的第六天，困在堆疊而成的石塊上進退不得的船上，浪子面對滿腹牢騷的老先生，有一段感嘆，頗有意思：

「他媽的臭巴子！」浪子對著烏鴉跳起來。「你可嚇唬不了我！你等著瞧吧！我死不了！我要活著攪得天翻地覆，給你一點顏色看看！山呀，水呀，野獸呀！烏鴉呀！你們毀得了人嗎？你們毀了人的身體，毀不了人的精神呀！船打翻了，人淹死了，山還是山，水還是水，千千萬萬的人又生出來了！千千萬萬的人又在灘上活過來了！天下是浪子的呀！你知道嗎？王八蛋！古代的帝王，今世的蔣介石毛澤東，他們都是浪子呀！浪子不死的呀！你知道嗎？王八蛋，浪子是不死的呀！」<sup>28</sup>

26 聶華苓，〈桑青與桃紅〉，《聯合報·副刊》，1970.12.14，9版。

27 聶華苓，〈桑青與桃紅〉，《聯合報·副刊》，1970.12.31，9版。

28 聶華苓，〈桑青與桃紅（四）〉，《明報月刊》6卷3期（1971.03），頁97。

在此浪子的話代表的是其身處於擱淺渡船上對於自我精神力的喊話，不受到道德禮教束縛的浪子，以「天下都是浪子」將跨越時空與歷史事件的「帝王」兜在一起，也將古代的帝王與今世的蔣介石毛澤東相提並論，有其生猛的野性，然而《聯合報·副刊》上將古代的帝王與今世的蔣介石、毛澤東都是浪子此一段落予以刪除。<sup>29</sup>

其三是涉及正面書寫共產黨形象，和直接描寫共產黨所提出的口號與相關活動的部分，都予以刪除。諸如故事場景為一群浪子於猛虎崗和瀘定橋之間的高山所講述關於吊橋的故事，其中包括如何奪瀘定橋和渡大渡河此一大段，於《聯合報·副刊》上全面刪除，<sup>30</sup> 刪除原因推測包括浪子們身分所代表無黨派的組織，以及浪人們所唱的是「艱苦奮鬥」與「根據地」皆是共產黨的口號。此外，桑青國共戰爭的經歷，記錄在 1948 年 12 月至 1949 年 3 月桑青北平日記中，其中有不少涉及左翼學生在北平大學校園活動，也予以刪除，諸如有左翼思想傾向的杏杏向沈家四合院描述北平圍城街上的情景時，提到政府現在大赦大放，杏杏所提到學生被釋放等幾句被刪除，以及當時青年學生所設的學校民主牆和學生扭秧歌也遭到刪節，以及杏杏表明她受共產黨思想影響，提到她想當共產黨還當不成，因為成份不純，需要重新學習、重新做人，<sup>31</sup> 這些對話都被刪除。<sup>32</sup>

與共產黨有關的正面描述中，沈家慶無疑是一個關鍵性的人物，他是遭受沈老太太毒害女傭的兒子，他代表從傳統舊家庭出走，受到共產黨思想改造而邁向新生活。沈家慶和沈老太太的對話，更是呈現左傾的家慶所代表的共產主義思潮，與沈老太太所維護舊有傳統價值的對照，當沈家慶提到改了名字成為林立，是和國家象徵有關，亦將整個舊中國連根拔掉，才能創造新中國，<sup>33</sup> 並提到新生

29 聶華苓，〈桑青與桃紅〉，《聯合報·副刊》，1970.12.23，9版。

30 聶華苓，〈桑青與桃紅〉，《聯合報·副刊》，1970.12.04，9版。

31 聶華苓，〈桑青與桃紅（八）〉，《明報月刊》6卷7期（1971.07），頁94。

32 聶華苓，〈桑青與桃紅〉，《聯合報·副刊》，1971.01.03-04，9版。

33 同註31，頁95。

的自己是為中國共產黨的真理而活，<sup>34</sup> 這些描述沈家慶受到共產主義思想改造的部分，在《聯合報·副刊》遭到刪除。<sup>35</sup> 其中刪除的一大段描述，在於沈家慶自述在 1942 年延安文藝整風運動中他個人自述的經歷，沈家慶提及受到整風運動中對於自由主義、個人主義等的批判，以建立新生的過程，沈家慶提到他父親是資產階級剝削者，由於父親對自己的壓迫因而認定自己為孤兒，繼而提到 1937 年日本人占領北平，15 歲的他從北平逃到八路軍根據地遵化，從黨的候補黨員一路到正式黨員的歷程，其中對於自己受過國民黨反動教育、舊制度餘孽，以及對於自己壓迫無產階級經歷深切反省，並歷數整風過程中自我的多次反省報告，撇除溫情主義，最後提到革命高於一切，沈家慶已死了，林立誕生的過程。<sup>36</sup>

其四在於《聯合報·副刊》刪節的版本中最關鍵之處是對於北平圍城中共產黨取得勝利進城的史實之處理。關鍵之處，一為北京圍城期間國共對峙十分激烈時，解放軍廣播強勢放送，一方面呼籲人們不要逃亡，留在原地；一則說明戰役中解放軍階段性的進展，從平津戰役到收復張家口的消息，與中共將國民黨 43 人列為頭等戰犯的聲明，這些共產黨的廣播都予以刪除，也一併刪除其中提到京劇戲文，如空城計等唱詞，<sup>37</sup> 其中一處更將新華社提到毛澤東拒絕蔣介石元月一日所提出的和平要求，提及人民解放軍已於本日解放天津，置換成為國民黨的廣播：

我軍已於本月撤離天津，共匪不顧人民生命財產，天津市郊十幾個村莊現仍在大火中……<sup>38</sup>

關鍵處二為《明報月刊》中呈現解放軍進入北平的場景，「歡迎強大的人民軍隊進入北平！人民解放軍是祖國和平的保護者！是祖國社會主義建設的保護

34 同註 31，頁 95。

35 聶華苓，〈桑青與桃紅〉，《聯合報·副刊》，1971.01.06，9 版。

36 同註 31，頁 94-97。

37 聶華苓，〈桑青與桃紅〉，《聯合報·副刊》，1971.01.08，9 版。

38 同註 37。

者……」<sup>39</sup>等廣播聲音在《聯合報·副刊》都予以刪除，畫面上的標語，如「天安門是人民革命的聖地！」等口號及解放軍的稱謂，提到解放軍的「美式」裝備等，也予以刪除，僅保留「天安門上掛著旗幟、畫像和標語。風沙在天安門前面打滾。廣場的人影向著天安門幌動」與「一幅巨大的毛澤東畫像在風沙中現出來」<sup>40</sup>這樣對於場景白描的陳述。

根據聶華苓的說法，可知小說被禁是由於第二部對於北平圍城的描寫，刻劃出共產黨勝利入城此一歷史事實，對於退守台灣的國民黨政權所造成的刺激：「第二部寫的是北平——那時叫北平，而不是北京。北平受到共產黨的圍攻；舊制度崩潰了，一切舊的東西都要消滅了；共產黨進城了。這是他們無法接受的事實。」<sup>41</sup>

聶華苓直言以中國近代動亂為經緯的作品涉及到共產黨圍城的史實，使得國民黨政權蒙受挑戰，此外聶華苓也尖銳地指出國家宣傳文學對於道德價值觀的注重，以樹立國民黨自詡為中國傳統文化正統繼承人的一面：「因為那就表示國民黨失敗了。而且，他們自認為是代表傳統中國的。他們現在仍然是這個態度：舊的文化、舊的價值觀念、舊的家庭制度、舊的傳統——他們自認為是中國傳統文化的正統繼承人。」<sup>42</sup>對照《聯合報·副刊》刪改版與《明報月刊》上完整版，更可以看到《聯合報·副刊》版本如何回應主導文化下對於道德價值觀的整束，《明報月刊》中呈現在北平圍城砲聲猛烈之際，桑青與家網洞房外，流亡學生自導自演皮影戲，其中一老生一丑角的唱詞呈現出對文化正統的諷刺與反動：

大學之道	(老生)
先生慣例	(丑旦)
在明明德	(老生)

39 聶華苓，〈桑青與桃紅（七）〉，《明報月刊》6卷6期（1971.06），頁78。

40 聶華苓，〈桑青與桃紅〉，《聯合報·副刊》，1971.01.13，9版。

41 林克紀錄，〈聶華苓和非洲作家談《桑青與桃紅》（下）〉，《明報月刊》19卷1期（1984.01），頁88。

42 同註41。

先生抬得 (丑旦)  
在親民 (老生)  
先生扛出門 (丑旦)  
在止於至善 (老生)  
先生埋泥潭 (丑旦)  
君不君 (老生)  
君不君、程咬金 (丑旦)  
臣不臣 (老生)  
沉不沉、大火輪 (丑旦)  
父不父 (老生)  
浮不得、大豆腐 (丑旦)  
子不子 (老生)  
紫不紫、大茄子 (丑旦)<sup>43</sup>

相較於老生對於儒家文化經典〈大學〉的引述，丑角透過不斷重複，以戲擬的方式嘲弄儒家文化，呈現出戰爭下被鬆動的傳統文化道統，<sup>44</sup>此一段落在《聯合報·副刊》予以刪除。

從此一角度進行觀察，《聯合報·副刊》後期受到主導文化審查之影響更為巨大，對比第一部擱淺船上絕望人們的尋歡作樂，其中有豪放女桃花女袒露胸部的純真放浪，與男女調笑的情節，這些對於酒神式歡愉本能的謳讚，與其中情色的部分所象徵的精神與本能都予以保留；但在小說第二部的尾聲，桑青與沈家綱搭火車逃往南方，此處亦有一場破廟中年輕大學生逃難的婚禮，但其中兩處被刪除，第一處提到「在大殿上打滾翻筋斗。衝著菩薩撒撒野！天皇，地皇，人皇，

43 聶華苓，〈桑青與桃紅（七）〉，《明報月刊》6卷6期（1971.06），頁75-76。聶華苓，〈桑青與桃紅〉，《聯合報·副刊》，1971.01.11，9版。

44 黃儀冠，〈鄉關何處——論《桑青與桃紅》的陰性書寫與離散文化〉，《政大中文學報》1期，頁288。

全管不著！」<sup>45</sup>，第二處提到在大殿門口看著新郎新娘沉沉睡在泥地上，提到「右邊的乳房貼著他的胸膛，正好照著月光」<sup>46</sup>這句也被刪除。第一處在逃難途中諸神殘破的廟中，眾人以各種表演藝術，進行一場嘉年華式的狂歡，其中粗言粗語涉及對於民間信仰的挑釁；第二處是對於身體場景的直描，沒有涉及男女情愛露骨的刻劃，卻遭受到刪改，可以看到當時審查的嚴密，以及到後期對於情色描述更為壓抑的一面。其他的例子，包括桃紅給移民局的第二封信中，強調自己是外鄉人的桃紅，在美國四處流浪，講述在公路搭車經歷被司機調戲的話語，其中司機與桃紅的對話：「你知道豪豬怎麼性交嗎？噯？小女人！你知道豪豬怎麼性交嗎？嗚——嗚——」<sup>47</sup>此句對話也成為被「抹除痕跡」的證明。

《聯合報·副刊》小說連載，終止於桃紅給移民局的第二封信，保留桃紅在 80 號公路上所敘及十九世紀唐勒隊拓荒西征而後糧食殆盡，只得人吃獸的慘狀。<sup>48</sup>從上述對於《聯合報·副刊》所刪改版本的分析，可以看到《桑青與桃紅》對於「政治性」與傳統文化的處理，與對於情色的壓抑，如同黃秀玲所分析：「但到了第三部份，因為飽受許多政治和道德的惡意攻擊（對國民黨專制的含蓄諷刺及對桃紅性生活之「色情」描述），編輯們被迫將之腰斬。」<sup>49</sup>關於《聯合報·副刊》中《桑青與桃紅》突然停刊的始末，在《明報》的（六）連載部分，刊登出日期標示為 4 月 13 日「聶華苓的聲明」：

「桑青與桃紅」於一九七〇年十二月一日起，同時在明報月刊和台灣的聯合

45 聶華苓，〈桑青與桃紅（九）〉，《明報月刊》6卷8期（1971.08），頁79。聶華苓，〈桑青與桃紅〉，《聯合報·副刊》，1971.01.22，9版。

46 聶華苓，〈桑青與桃紅（九）〉，《明報月刊》6卷8期，頁79。聶華苓，〈桑青與桃紅〉，《聯合報·副刊》，1971.01.11，9版。

47 聶華苓，〈桑青與桃紅（九）〉，《明報月刊》6卷8期，頁81。聶華苓，〈桑青與桃紅〉，《聯合報·副刊》，1971.02.04，9版。

48 聶華苓，〈桑青與桃紅〉，《聯合報·副刊》，1971.02.04，9版。

49 黃秀玲著，梁一萍譯，〈文本跨界之得失：以中國中心、亞裔美國和女性主義的批評實踐來看聶華苓的《桑青與桃紅》〉，黃秀玲著，單德興編，《華美：華美及離散華文文學論文集》下冊（台北：允晨文化公司，2020.12），頁510。

報開始連載。台灣版曾由作者和聯合報編者一再刪改；小說第一部和第二部刊出後，突然停止。聯合報發行人王愷吾先生來信說：「大作桑青與桃紅一文，在本報發表後，曾受到批評。名家手筆，深刻入微。惟國內情況不同。未能為國內讀者普遍接受，幾經研商，不得已乃予停刊，其中情形，諒荷台察。」信中所說「曾受到批評」究竟是甚麼人批評？王先生並未加以說明。<sup>50</sup>

聶華苓的聲明也對於《桑青與桃紅》停刊的始末現身說法，由於《桑青與桃紅》涉及敏感議題，台灣版是否由於作者與聯合報編者進行自我審查而導致《聯合報·副刊》版本大規模的刪修呢？這無疑是當時主導文化意識形態規範所造成的現象，然而關於《聯合報·副刊》版本大規模的刪修，黃秀玲也提醒需關注作者的「真實意圖」<sup>51</sup>此一面向；而關於聯合報發行人王愷吾先生對於《桑青與桃紅》曾受到批評的說法，聶華苓曾提到《聯合報·副刊》最後以「作家原稿因故未到」理由，終止了小說連載：「小說在台灣連載的時候，編輯和報刊不斷受到警備總部、安全局、調查局、市警局、國民黨黨部、許多不同組織的壓力。報紙不得不停止連載，沒有任何解釋，只有說作者原稿未到。」<sup>52</sup>聶華苓的說法呈現出戒嚴時期台灣文壇氣氛的詭譎，與外在政治環境風氣對於《桑青與桃紅》刊行之影響。

#### 四、《明報月刊》發表之歷史脈絡——兼論《桑青與桃紅》在港傳播之面向

《桑青與桃紅》運用大量心理描寫、意識流、個人獨白的手法，藉由時空經緯交錯的兩條軸線，描繪出桑青與桃紅在廣大時空之移位，敘述四〇年代中國抗日戰爭至國共內戰到國民黨撤退來台，以及桑青從四川至北京到台北到美國流亡之過程，書寫主角桑青歷經四個不同階段的流放經驗，包括抗戰勝利前夕的瞿塘

50 〈聶華苓的聲明〉，《明報月刊》6卷5期（1971.05），頁88。

51 黃秀玲提醒中文《桑青與桃紅》刪減本和未刪減本之間的差距非常大。作者不情不願地默許了審查員的「建議」，然而刪減本不能簡單地置於作者的「真實意圖」之外。同註49，頁512。

52 林克紀錄，〈聶華苓和非洲作家談《桑青與桃紅》（下）〉，《明報月刊》19卷1期，頁88。

峽、大陸淪陷前的北京圍城、五〇年代白色恐怖底下的台北閣樓以及六〇年代的美國，來書寫桑青歷經不同階段而逐漸人格分裂而形塑成為桃紅，最終桃紅取代桑青，以此審視時代與政治環境壓迫下一個女人所面臨的極端處境。剖析《桑青與桃紅》版本的爭議，也必須置放在1970年代《明報月刊》發表的歷史文化脈絡，透過台港兩地文壇交流史，才能有更全面之理解。

1970年代香港處於火紅的年代，也具有思想爭鳴的一面。<sup>53</sup> 洛楓研究中對於1970年代香港專欄文化的歷史及社會脈絡進行分析，洛楓提到1970年代香港經歷六七暴動，大量新移民湧入，此一時期香港重大的社會運動，分別為1967年爭取中文成為法定語文運動，1971年開展第一次保衛釣魚台運動，1973年反貪污、捉葛柏事件，以及1977至78年的金禧事件等，<sup>54</sup> 並且逐步分析社會運動、普及文化與中國因素對於1970年代香港的影響。<sup>55</sup> 葉輝分析1970年代香港的專欄文學，也提到七〇年代由麥理浩接手管治，開始順應非殖民化的國際大潮，逐步實施地方政制、公務員本地化、行政局沖淡白人色彩、成立廉政公署等。<sup>56</sup> 此外，1970年代香港經濟的轉型，也加速香港都市化的發展，並且帶動香港大眾文化的流行，其中包括：海底隧道通車、無線電視普及化、工業起飛、大力開發新市鎮，這些不但改變了香港人的生活型態，也改變了本港報業的生態環境。<sup>57</sup> 這些重大社會事件與都市化的生活型態，影響香港人的生活模式，也為香港本地的文學創作提供十分有利的創作空間。1970年代初期中國處於文革階段，而後由文革的封閉邁向經濟開放與改革，此一時期香港的出版環境相較於中國與台灣，相對自由開放，此一不受壓制的言論空間也得力於香港的文藝環境。

53 郭柳娜、陳智德，〈本土的沉思——七〇年代的香港文學〉，香港嶺南大學人文學科研究中心、香港文學研究小組編著，《書寫香港 @ 文學故事》（中國香港：香港教育圖書公司，2008.01），頁205。

54 洛楓，〈從「解殖民化」到「本土意識」的探索——論七十年代香港專欄文化的歷史與社會脈絡〉，《請勿超越黃線——香港文學的時代記認》（中國香港：文化工房，2008.07），頁10。

55 同註54，頁18-19

56 葉輝，〈七〇年代的專欄和專欄文學〉，《書寫浮城：香港文學評論集》（中國香港：青文書屋，2001.05），頁135。

57 同註56。

洛楓從解殖民化、本土化、殖民主義與本土意識等概念來解析 1970 年代香港社會中各種政治、經濟、歷史與文化力量的互相角逐，特別提出：

七十年代是香港歷史的重要時段，不單是因為港英政府的政改與社會建設奠定了香港日後經濟繁榮的基礎，同時也為了在解殖化的過程裡、民間社會運動的推演中，以及普及文化的傳播與文學創作的提升下，逐漸成型的本土意識，著眼於本地生活經驗的內容與文化共識，並從而確立「香港人」的身分認同；此外，七十年代已經隱約浮現的九七問題，不但顯示了中國因素對於本土意識發展的存在性影響，同時亦下開八、九十年代各項有關書寫香港歷史、重認文化身分的議題。<sup>58</sup>

1970 年代是香港本土意識興起的重要階段，文學作品也著重於呈現人物的生活感受與當下的社會面貌，相關研究也指出七〇年代香港文學從本土化角度所建立的獨特聲音，其中包括「更著重對本土經驗的反省和提問、外在現實的變奏與轉化、城市的今昔對比、歷史的思考以及對於本地事務投放人文關懷。」<sup>59</sup>1970 年代有與 1950、60 年代截然不同的本土面貌，創刊於 1959 年的《明報》與創刊於 1966 年的《明報月刊》，也經歷香港從 1950 年香港移民社會與難民文學的背景，過渡到 1960 年代，到了 1960 年代中期至 1970 年代隨著香港都市化的發展，呈現出本土化香港文學的特色，反映出香港外在現實的變奏與轉化。

關於《明報》與《明報月刊》相關的研究並不多，<sup>60</sup>其中較為重要的是以金庸和《明報》發展史為研究課題的專書。創刊於 1959 年的《明報》，是金庸有意建立自己出版事業所創辦的日報，<sup>61</sup>出身於《大公報》的金庸早期與左派報人

58 同註 54，頁 18-19。

59 郭柳娜、陳智德，〈本土的沉思——七〇年代的香港文學〉，香港嶺南大學人文學科研究中心、香港文學研究小組編著，《書寫香港 @ 文學故事》，頁 210-211。

60 具有代表性為張圭陽，《金庸與明報傳奇》（台北：允晨文化公司，2005.06）。

61 1959 至 1961 年創刊之初屬於通俗小報的形式，並不涉及政見，其中是以金庸的《神鵰俠侶》為其賣點，並

較為友好，1962年5月在社評和報導上大量刊載和「難民潮」有關的評論，此一報導態度也促使金庸和左派決裂埋下伏筆，<sup>62</sup>可以看到「《明報》與左派報章立場不同，也不是右派報章的一味反對中共，而是突出以人為本，重視人的尊嚴與生命的總原則。」<sup>63</sup>，這顯示出《明報》政治中立和民間辦報、不受黨派思想影響的特色，<sup>64</sup>張圭陽的研究中提到《明報》在整體印象中是「右派文人集結的副刊」，以「批判中國大陸政權為主導的副刊園地」，在談論中國大陸及文化思想的專欄當中，主要還是以批評中共的文人為主，如司馬長風、胡菊人、三蘇、項莊、周青，<sup>65</sup>其中需注意《明報》中立的立場，<sup>66</sup>1970年代也可以觀察到《明報》對於共產黨政權的態度：<sup>67</sup>

隨著北京糾正「文化大革命」的做法，在七十年代又恢復連串外交活動，如1971年進入聯合國，1972年與日本建交，而美國總統尼克遜亦於同年訪問北京，這一連串事態的發展，都是符合《明報》以及金庸個人對於中國國事發展的理念。《明報》對中共的批評減少了，對於中共的領導人，尤其以周恩來總統為首的領導人，態度更轉趨溫和。<sup>68</sup>

---

多刊登影視資訊、輕鬆通俗的文章、漫畫，很少涉及嚴肅的話題，以市井階級為主要讀者。陳素雯、馮志弘，〈《笑傲江湖》的政治諷喻與《明報》的轉型（1962-1969）〉，《興大中文學報》22期（2007.12），頁101。

62 同註61，頁102。

63 同註61，頁103。

64 同註61，頁103。

65 張圭陽，《金庸與明報傳奇》，頁252。

66 《明報》社評對於國民黨並沒有一個總的立場，只是依據個別事件而評論，故此否定和肯定的次數相同，更多的是持不置可否的態度。見張圭陽，《金庸與明報傳奇》，頁203。

67 《明報月刊》6卷7期〈編者的話〉對於若干讀者提出刊物偏向親共之疑慮，如此回答：「同期刊出有兩篇文章，可能給讀者或某些敏感人士有所疑慮，這種疑慮就是：我們的政治立場如何？是否有親共之嫌——若有此種疑慮，請注意同期其他文章的立場和意見……我們的回答是：我們是以知識和事實來看待這個問題，是就是，否就否，並不因政治立場而顛黑倒白，特別以科學知識為然。」〈編者的話〉，《明報月刊》6卷7期（1971.07），頁108。

68 同註65，頁204。

1973年4月金庸訪問台灣十天，6月於《明報》發表〈在台所見、所聞、所思〉，全文並且在《明報月刊》上轉載，金庸提到台灣喊「反攻大陸」的口號是不合時局，但對於國民黨對台灣的施政方針基本上是肯定，也在文中對於中共有頗多肯定。<sup>69</sup>身為《明報》系統刊物的《明報月刊》，1966年創刊，也和《明報》一樣維持一貫中立的立場。《明報月刊》是以文化、學術、思想為主，以全世界華人學者、知識分子為對象，在發刊詞強調是「作為海外華人溝通心聲的一個橋梁」，具有言論與立場的獨立性，編輯宗旨是「『五四』時代的北京大學式」與「抗戰前後的《大公報》式」，並且以「嚴肅負責的態度，對中國文化與民族前途，能夠有積極的貢獻」。<sup>70</sup>《明報月刊》凝聚一批海外知識分子，也為金庸搏得了良好的國際聲譽，<sup>71</sup>《明報月刊》初期的主編是金庸，1967年後改由胡菊人負責，<sup>72</sup>胡菊人為《明報月刊》任期最長的總編輯。

胡菊人於1966年應金庸之邀出任《明報月刊》總編輯，同一時期也曾經參與創辦《盤古》，成為《盤古》發起人之一，<sup>73</sup>1980年轉任《中報》及《中報月刊》總編輯，<sup>74</sup>胡菊人指出《明報月刊》的貢獻在於對中國文化的建樹與開拓，<sup>75</sup>在訪談中胡菊人提到個人事業對於中國民主理念的追求，「至於我個人的事業、工作，我向來希望中國可以成為自由民主的國家」，<sup>76</sup>並且重申「我想很難以一句話總結過去的工作，但中國要民主、中國要自由、中國人要有好的生活，這些

69 同註 65，頁 203-204。

70 同註 65，頁 194-195。

71 同註 65，頁 194。

72 胡菊人口述提及曾歷任《大學生活》、《中國學生周報》社長和督印人，1962年應美國國務院邀請到當地考察半年，回港後離開「友聯」，於大學中心（University Center）短暫工作，後轉入美國新聞處擔任《今日世界》叢書部編輯。見盧瑋鑾、熊志琴編著，〈訪問紀錄 胡菊人〉，《香港文化眾聲道》第一冊（中國香港：三聯書店，2014.07），頁 215。

73 同註 72，頁 227。

74 盧瑋鑾、熊志琴編著，〈訪問紀錄 胡菊人〉，《香港文化眾聲道》第一冊，頁 215。

75 胡菊人提及：「那時候正值『文革』發生期間，《明報月刊》刊登有關『文革』的文章較多，基本來說，《明報月刊》是對中國文化有所建樹、有所開拓的雜誌。查先生當時請我負責《明報月刊》，他則負責報紙。那時候《明報月刊》幹得不錯……」。同註 74，頁 218。

76 同註 74，頁 219。

理念是值得堅持的，我過去一直堅守這原則。」<sup>77</sup>

從胡菊人提出《明報月刊》對中國文化建樹與開拓的貢獻，可以看到《明報月刊》具有模塑一代人精神面貌的一面，在此觀察《桑青與桃紅》於1970年至1972年連載《明報月刊》期間，此一綜合性刊物中幾個值得關注的面向，其一是對於當時香港經濟與文化現象之觀察，如〈香港「已發展」乎？「發展中」乎？亞洲紡織月刊〉<sup>78</sup>主要譯至亞洲的《紡織月刊》，探討香港由於天然資源的缺乏、發展途徑的限制，日益增加的競爭和海外市場的貿易限制，因而造成香港未來發展的困難，在此探討攸關香港存亡的經濟問題；〈香港中文教育患了什麼病？〉<sup>79</sup>觸及香港中文運動與各界人士所提出的中文教育改革，從決策者的責任、編選者的責任、學校與教師的責任和出版商與文化人，來思索如何提升港人中國語文的能力；〈中美交往聲中的香港前途〉中，<sup>80</sup>探討北京展開兵兵外交，尼克遜宣布訪問北京，以及不少國家贊成中共取得聯合國席位，來思考香港未來發展之議題，在此從經濟與貿易的角度提出香港政治地位應不會有太大改變，可以看到中國大陸的局勢變化，一直牽動著香港社會的前途。此外，《明報月刊》呈現出香港文學生存之特色，如鄭樹森所言香港文學「長期在一些基本上與文學無關的雜誌上依賴掛單」，<sup>81</sup>其中刊載溫健騮<sup>82</sup>、鍾玲玲<sup>83</sup>、戴天<sup>84</sup>、蔡炎培<sup>85</sup>等相關詩作，都深具文學性與可讀性。

其二，是對於中國五四以來文化與文學的關注，此一時期包括周策縱發表

77 同註74，頁231。

78 〈香港「已發展」乎？「發展中」乎？亞洲紡織月刊〉，《明報月刊》6卷2期（1971.02），頁5-6。

79 曹春山，〈香港中文教育患了什麼病？〉，《明報月刊》5卷11期（1971.02），頁58-61。

80 劉達仁，〈中美交往聲中的香港前途〉，《明報月刊》6卷10期（1971.10），頁5。

81 鄭樹森，〈談四十年來香港文學的生存狀況〉，《從諾貝爾到張愛玲》（台北：印刻文學出版公司，2007.10），頁218-219。

82 溫健騮，〈詩四首：放逐、父親和兒子、我的妻子、神語〉，《明報月刊》5卷10期（1970.10），頁93。

83 鍾玲玲，〈詩四首：我的燦爛在一九一九、我看見他、假若我死、表弟的來信語〉，《明報月刊》5卷11期，頁98。

84 戴天，〈1971年所見〉，《明報月刊》6卷8期，頁84-87。

85 蔡炎培，〈扶夢曲〉，《明報月刊》6卷8期，頁83。

《五四運動史》部分章節，<sup>86</sup>《五四運動史》對於五四歷史圖景進行描繪，細緻描述五四運動的成因和發展過程，分析新式知識分子的社會功能和歷史任務，在〈編者的話〉提到：「對於這個在中國近代史上極為重要的五四運動，一直為各方面曲解、爭議、聚訟，現在我們可以從周策縱先生的論著中，得到正面的認識。」<sup>87</sup>此外，也包括李歐梵所撰述的「魯迅內傳」，對於魯迅內心世界的探討，其中針對少有人探討的魯迅童年進行剖析，以呈現出魯迅童年「甜蜜而又痛苦的記憶」，此外也針對魯迅成年期進行探討，如同在〈編者的話〉提到主要是針對政治與文化界所爭論魯迅是否有虛無色彩進行解析，並提供清楚剖視。<sup>88</sup>

其三是對於中國現狀進行報導，《明報月刊》代表香港報刊對於中國大陸消息之客觀報導，其中包括黃愛華所撰述「七十年代的中共」系列文章，<sup>89</sup>此一系列文章是從海外華僑的立場，對於中共提出建言，希望中國人民生活獲得改善。<sup>90</sup>此外，史誠之的〈歷史轉折與中共的將來——簡論解放軍的過去與中共的未來〉<sup>91</sup>系列作品，是從歷史、民族與文化的角度探討中國及其對外關係，兼及對於世界局勢的分析，並由此探索中國現狀與未來發展。此外，也包括對於中國醫療制度變革的深入報導<sup>92</sup>以及刊載中國共產黨與解放軍創始人之一張國燾的傳記。<sup>93</sup>

其四為對於海外華人文化之探討，可以看到《明報月刊》對於海外華人現況之關懷，特別注重美國華裔世代文化差異與華裔青年的心理背景；如〈美國華僑

86 周策縱，〈「五四運動」的定義——「五四運動史」第一章：導言〉，《明報月刊》6卷1期（1971.01），頁6。

87 〈編者的話〉，《明報月刊》6卷1期，頁108。

88 其中包括李歐梵，〈魯迅的幼年（1881-1896）——「魯迅內傳」的商榷與探討〉，《明報月刊》5卷12期，頁5-11；李歐梵，〈魯迅的成年（1898-1917）——「魯迅內傳」的商榷與探討〉，《明報月刊》6卷1期，頁53-60。〈編者的話〉，《明報月刊》6卷1期，頁108。

89 其中包括黃愛華，〈七〇年代的中共（五）〉，《明報月刊》5卷11期，頁12-16；黃愛華，〈七〇年代的中共（六）〉，《明報月刊》5卷12期，頁11-15。

90 〈編者的話〉，《明報月刊》5卷12期，頁100。

91 其中包括史誠之，〈歷史轉折與中共的將來——簡論解放軍的過去與中共的未來（十一）結論〉，《明報月刊》5卷11期，頁78-84；史誠之，〈歷史轉折與中共的將來——簡論解放軍的過去與中共的未來（十二）結論〉，《明報月刊》5卷12期，頁26-30。

92 吳湘泉，〈中共醫療制度的變革〉，《明報月刊》6卷7期，頁33-39。

93 其中包括張國燾，〈我的回憶（張國燾自傳）〉，《明報月刊》5卷11期，頁85-90；張國燾，〈我的回憶（張國燾自傳）〉，《明報月刊》5卷12期，頁85-90。

青年對中國問題的看法》<sup>94</sup> 呈現出三派青年對於中國的想法，並且把美國華僑三代之間的心態表現出來；〈義和團·紅衛兵·彭明敏——美國東西部的華人風波〉<sup>95</sup> 對於當時舊金山的觀察，也披露出舊金山「二世」與「三世」華僑子女文化現象，並報導彭明敏來美執教的情形，在〈編者的話〉提到「用幽默輕鬆的文筆，把近年來最激烈的一項華人『鬥爭』敘述出來，有點像『新老殘遊記』。」<sup>96</sup>；此外，司馬桑敦之〈蠻漢灘小住（美國航訊）〉，<sup>97</sup> 提及中華航空公司招待台灣各報駐東京的記者們到美國西岸進行觀光旅行，司馬桑敦分享參觀紐約城的中心地區蠻漢灘生活上的感觸，〈編者的話〉認為「用優雅散文把世界大城中的大城紐約，做一幅直感的素描。」<sup>98</sup>

其五為掌握保釣運動的時代脈動，重申民族主義的立場，其中包括將七七抗戰和釣魚台事件聯繫，刊登〈紀念「七·七」——展望「保釣行動」〉一文，<sup>99</sup> 在〈編者的話〉重申「在七·七抗戰經過了三十四年的今天，我們中國人不能不承認，又再一次受到日本政府的欺侮，也受到美國政府的欺騙。」<sup>100</sup> 在此從國族論述的立場，回到歷史淵源，再次批判美日強權政治的手段。其次，也有對於琉球的歷史背景爬梳的文章，如〈失琉球記〉<sup>101</sup> 將琉球的歷史背景以及它和中國的隸屬關係，以致於戰後中國、美國、蘇聯和日本國際政治對於琉球問題之處理予以披露；〈釣魚台列島詳圖〉對於釣魚台海域的地理情形進行深入報導。此外，《明報月刊》也製作各地及海外華人保衛釣魚台特輯，〈香港七·七事件貴在當局〉<sup>102</sup> 提到由香港專上學生聯會發動之香港「七·七」保衛釣魚台示威，

94 畢唯才，〈美國華僑青年對中國問題的看法〉，《明報月刊》6卷1期，頁61-67。

95 黃光宇，〈義和團·紅衛兵·彭明敏——美國東西部的華人風波〉，《明報月刊》6卷2期，頁61-71。

96 〈編者的話〉，《明報月刊》6卷2期，頁108。

97 司馬桑敦，〈蠻漢灘小住（美國航訊）〉，《明報月刊》6卷2期，頁26-30。

98 〈編者的話〉，《明報月刊》6卷2期，頁108。

99 康展仁，〈紀念「七·七」——展望保釣行動〉，《明報月刊》6卷7期，頁16-18。

100 〈編者的話〉，《明報月刊》6卷7期，頁108。

101 范叔寒，〈失琉球記〉，《明報月刊》6卷8期，頁2至9。

102 劉達仁，〈香港七·七事件貴在當局〉，《明報月刊》6卷8期，頁10-11。

受到香港警署之暴力鎮壓所演變之流血事件，導致各界輿論之責備；〈英國七·七保釣示威〉<sup>103</sup>提及倫敦保釣行動委員會的行動，如何喚起僑胞的民族良心之情形；〈釣魚臺列嶼是我們的〉<sup>104</sup>則是由該刊資料室有系統剪裁羅列台灣有關的資料，使海外讀者知道保釣事件真相以及釣魚台列嶼的地理歷史情況，並分析日人的反應與日人的圖謀、日本政府的蠻硬和台灣當局的態度，其中特別提及台灣當局未有嚴正的立場，應是有內部的壓力；<sup>105</sup>〈海外中華兒女大結合——美國密西根安娜堡「國是會議」側記〉<sup>106</sup>呈現出留美學生保釣文章，並側記國是會議情形，此外亦有文章呈現出保釣運動的歧見與分裂。<sup>107</sup>

其六為與台灣有關之報導，則是以《自由中國》為關懷核心，由於胡菊人1950年代即加入友聯研究所工作，與友聯同人關係密切，友聯同人和台灣《自由中國》雜誌基於民主自由的理念而互相支援，並且彼此宣傳合作，《明報月刊》中也呈現對於標榜思想自由之《自由中國》的支持。司馬桑敦〈雷震和自由中國半月刊〉，<sup>108</sup>此篇為應日本亞細亞經濟研究所所作，為戰後台灣政治經濟研究之參考而撰述之報告大綱，將雷震入獄的經過、自由中國創立之宗旨，和保安司令部之衝突，和對於國民黨七全大會之意見，以至於要求國民黨厲行法治、建立制度，到自由中國如何被封閉，進行客觀描述。本文將自由中國運動視為國民黨分子自省的民主運動，將其發展過程和舊權力結構發生衝突的面向呈現，以作為理解此一時期國民黨內部運動的真實面目，〈編者的話〉提及：「我們可以做一個假定，如果國民黨當時真正能開放言語、厲行改革，今日的局面可能大大不同。但是，那時雷震他們所說的『這是絕續存亡的最後機會了』那些話，難道今天我

103 盧文亦，〈英國七·七保釣示威〉，《明報月刊》6卷8期，頁12。

104 本刊資料室，〈「釣魚臺列嶼是我們的」〉，《明報月刊》5卷10期，頁79-84。

105 同註104。

106 姚立民，〈海外中華兒女大結合——美國密西根安娜堡「國是會議」側記〉，《明報月刊》6卷10期，頁86-93。

107 齊平，〈從「聯合」到對簿公庭——「釣魚台運動」與留美學生刊物〉，《明報月刊》6卷10期，頁66-68。

108 司馬桑敦，〈雷震和自由中國半月刊〉，《明報月刊》5卷11期，頁17-22；《明報月刊》5卷12期，頁62-69。

們還好意思再說一遍嗎？」<sup>109</sup>在此讚揚《自由中國》所扮演之「諍言讜論」的角色，和台灣島內國府高壓管制，文化人動輒得咎的情況形成對比：

魯迅有一篇文章叫做「無聲的中國」，其實，中國是一直有「聲音」的，但人民所發出的聲音，卻沒有人聽，這纔是最可悲的事實。「自由中國」半月刊等人當年所發出的聲音，不可謂不義正詞嚴，我們今天讀「雷震和自由中國半月刊」這篇報導，仍感他們當時的諍言讜論之可貴，但卻落得封閉、下獄的下場。因此，中國之無聲，是因為聲音一直給統治者壓制下去了。<sup>110</sup>

此外，《明報月刊》刊載 R. David Arkush 所撰述的〈憶念殷海光先生〉，<sup>111</sup>提到殷海光秉持羅素自由主義的理念，並以身作則，表明其精神的自由，並以這些精神作為學子的性靈，為其偉大之處。<sup>112</sup>在此並刊登〈殷海光書簡選〉；<sup>113</sup>以及刊登友聯書報在殷海光逝世周年，所推出的殷海光選集三卷，從政治言論、學術・播譯・書評與書信・雜著等面向來探討殷海光生平與思想<sup>114</sup>《自由中國》中期以後與國民黨政權愈趨緊張的關係下，身處於香港第三空間的《明報月刊》有別於台灣當時反共的文藝氣氛，適時提供言論自由的環境，對於雷震與殷海光這些追求自由民主理念的知識分子予以聲援，是為具備前瞻性的《自由中國》發出海外之聲，而曾在 1951 年加入《自由中國》編輯會的聶華苓，屬於《自由中國》陣營的理想主義者，在台灣的生活因為 1960 年代雷震案的牽連而深受影響。

《明報月刊》上，聶華苓發表此一時期兩部重要長篇小說〈桑青與桃紅〉、〈千山外，水長流〉（1984.01 至 1985.02）、此外還包括〈一個脊骨挺直的中國

109 〈編者的話〉，《明報月刊》5 卷 11 期，頁 100。

110 〈編者的話〉，《明報月刊》5 卷 12 期，頁 100。

111 R. David Arkush 著，盧蒼譯，〈憶念殷海光先生〉，《明報月刊》6 卷 1 期，頁 17。

112 同註 111，頁 17。

113 盧蒼整理，〈殷海光書簡選〉，《明報月刊》7 卷 3 期（1972.03），頁 35。

114 《明報月刊》5 卷 10 期，頁 22 所刊載「殷海光選集隆重出版」的廣告。

人——陳映真〉（1979.11）等。其中《桑青與桃紅》於1970年12月至1972年4月連載於《明報月刊》，由於《明報月刊》的刊載《桑青與桃紅》呈現出完整全貌，證明其小說的文學價值。《明報月刊》對於《桑青與桃紅》作品藝術性與思想性的理解屬於先驅，也特別關照《桑青與桃紅》在風格、敘寫及結構上的創新，開創出不同既往的小說模式，給予不平凡的印象：

聶華苓女士的中篇小說「桑青與桃紅」，自本期起連載，這是聶女士多年來的力作，無論在文字風格、人物描寫及故事結構上，都有極大的創新性。故事發展有逼人的動力與韻律感，在本期開始的篇章中已使我們有極不平凡的印象。<sup>115</sup>

〈讀者·作者·編者〉中，讀者也盛讚〈桑青與桃紅〉中所呈現出新的創作手法，並凸顯當代中國文學作品寫作手法之守舊，讀者來信中舉真報副刊鳳三先生專欄「花邊小品」中所撰述的「聶華苓頌」，其中提及「台灣女作家中，今客美國之聶華苓，可稱善寫小說，不僅為正統文藝創作，其表現方法之新穎，且劃時代，則當代任何中國小說家視之俱落伍，特不為保守者所接受耳！余南來逾二十一年，僅看連載小說一篇，則屬明報月刊連載之『桑青與桃紅』，即聶所執筆也。」<sup>116</sup>圖誌出《桑青與桃紅》於當代中國小說時代性之進程。

此外，值得注意的包括司馬桑敦1971年6月於《明報月刊》所發表的〈聶華苓在愛荷華〉，司馬桑敦藉由聶華苓的訪問以闡明其創作思想，特別是1968年聶華苓在芝加哥遇到精神分析師Karl Meniger，聶華苓更深入心理學與變態心理學的研究個案，也使其以「象徵的寫實」手法提出時代的命題：「這一時代中國『人』格上的分裂，社會情操上的分裂，政治倫理上的分裂。而她只是極其文

115 〈編者的話〉，《明報月刊》5卷12期，頁100。

116 〈讀者·作者·編者〉，《明報月刊》6卷9期（1971.09），頁108。

學的寫為中國人的『處境』，更發展而一般化為『人的處境』而已。」<sup>117</sup> 司馬桑敦提到他最感興趣為小說第三部的舞台，轉到台北，提到一個刑事罪犯藏匿在閣樓的故事，已清楚傳達其對於時代之抗議，也引發司馬桑敦擔心市場的反應及媒體的尺度：「我覺得她使用的寫作技巧太新了一些，正像紀德（Andre Gide）那篇『偽幣製造者』可能不易為市場所接受，甚至我更擔心台北是否會讓她這部小說無恙的發表下去；至於後者她興沖沖地告訴我，聯合報副刊編輯如何打國際電話搶她這篇小說稿，言下表示不會有問題。（豈知本年二月間，她便來信告訴我，聯合報已把「桑青與桃紅」腰斬了。）」<sup>118</sup> 1971年小說的第三部藉由《明報月刊》的刊載，呈現出桑青在閣樓上逃亡的故事，無疑也是反映出聶華苓如何以藝術化的技巧，來表述自身在台灣遭逢的歷史處境，眼睛與閣樓呈現出在政治威權體制與父權文化架構下，女性為爭取一己自由的控訴，也呈現出聶華苓承繼《自由中國》對於抗衡霸權與追求自由民主精神的抗爭。

## 五、結論

聶華苓集多種身分於一身，夾纏在傳統和現代、大陸、台灣與美國等多種意識型態集匯，《桑青與桃紅》多重論述位置也涵蓋了女性主義、海外華文文學、移民小說、少數族裔作品等。《桑青與桃紅》中聶華苓作品處理人的困境此一普世性議題，其重要核心關懷為二十世紀中葉華人世界的飄泊情境，《桑青與桃紅》此部作品出版也同樣見證了作者的流離顛沛與政治迫害。本文詮釋出聶華苓作品《桑青與桃紅》在台灣與香港傳播、演繹的過程，梳理複雜之歷史文化脈絡，《桑青與桃紅》在《聯合報·副刊》連載期間遭受到腰斬，其所刪改的版本中，可以看到主導文化對於作家意識形態的影響，基於政治考量，有關國共內戰與無產階級革命的素材，以及涉及挑釁傳統文化與情色的主題都在迴避之列，這也使得《聯合報·副刊》版本歷經刪節流離。同一時期，《桑青與桃紅》在《明報月刊》

117 司馬桑敦，〈聶華苓在愛荷華〉，《明報月刊》6卷6期，頁73。

118 同註117。

得以保留全貌，在港台文化交流中扮演重要角色，《明報月刊》此一時期的發表，無疑讓替欲衝破藩籬的聶華苓保留一處的發表園地，聶華苓對於當時香港自由創作風氣提出觀察：「那一小片天地的氣候對於寫作的人總是溫和適人的。」<sup>119</sup> 1970至80年代呈現出保釣運動浪潮和中國改革開放的時空脈絡下，台港兩地文化生產開啟新的跨區域連結框架，《明報月刊》輻輳出香港發揮的中介轉口功能，以及香港所扮演連結台灣和中國的橋梁，《明報月刊》對於中國現狀的探討，與對於海內外保釣運動的觀感與報導，在華文傳媒發展史上扮演重要的角色。《明報月刊》呈現出對於標榜思想自由之《自由中國》的支持，也讓《桑青與桃紅》第三、四部得以完整刊載，而《明報月刊》中《桑青與桃紅》的發表情形，是檢視1970至80年代台港文化交流頗值得關注的現象。



---

119 聶華苓，〈桑青與桃紅流放小記〉，《桑青與桃紅》，頁271。

## 參考資料

### 一、專書

- 洛楓，《請勿超越黃線——香港文學的時代記認》（中國香港：文化工房，2008.07）。
- 范銘如，《眾裏尋她——台灣女性小說縱論》（台北：麥田出版社，2008.08）。
- 香港嶺南大學人文學科研究中心、香港文學研究小組編著，《書寫香港 @ 文學故事》（中國香港：香港教育圖書公司，2008.01）。
- 張圭陽，《金庸與明報傳奇》（台北：允晨文化公司，2005.06）。
- 黃秀玲著，單德興編，《華美：華美及離散華文文學論文集》下冊（台北：允晨文化公司，2020.12）。
- 葉輝，《書寫浮城：香港文學評論集》（中國香港：青文書屋，2001.05）。
- 鄭樹森，《從諾貝爾到張愛玲》（台北：印刻文學出版公司，2007.10）。
- 盧瑋鑾、熊志琴編著，《香港文化眾聲道》第一冊（中國香港：三聯書店，2014.07）。
- 聶華苓，《桑青與桃紅》（台北：時報文化出版公司，1997.05）。
- ，《桑青與桃紅》（台北：時報文化出版公司，2020.02）。
- 蘇費翔、簡若珩主編，《異口同「聲」——探索臺灣現代文學創作的多元發展》（台北：秀威資訊科技公司，2022.05）。
- Toril Moi（托里·莫以）著，陳潔詩譯，《性別／文本政治：女性主義文學理論》（台北，駱駝出版社，1995.06）。

### 二、論文

#### （一）期刊

- 〈聶華苓的聲明〉，《明報月刊》6卷5期（1971.05），頁88。
- 白先勇，〈世紀性的漂泊者〉，《九十年代》239期（1989.12），頁93-95。
- 周芬伶，〈移民女作家的困與逃——張愛玲〈浮花浪蕊〉與聶華苓《桑青與桃紅》的離散書寫與空間隱喻〉，《台灣文學研究學報》2期（2006.04），頁95-114。
- 張小虹，〈《歐蘭朵》：文字／影像互動與性別／文本政治〉，《中外文學》23卷6期（1994.11），頁74-93。
- 梁一萍，〈女性／地圖／帝國：聶華苓、綢仔絲、玳咪圖文跨界〉，《中外文學》27卷

5期(1998.10)，頁63-98。

陳佳妉，〈論《桑青與桃紅》中的女性意識與歷史書寫〉，《中文研究學報》3期(2000.06)，頁147-163。

陳素雯、馮志弘，〈《笑傲江湖》的政治諷喻與《明報》的轉型(1962-1969)〉，《興大中文學報》22期(2007.12)，頁97-123。

曾珍珍，〈《桑青與桃紅》：七十年代的前衛女性身體書寫〉，《文學台灣》37期(2001.01)，頁63-68。

黃儀冠，〈鄉關何處——論《桑青與桃紅》的陰性書寫與離散文化〉，《政大中文學報》1期(2004.06)，頁269-301。

楊明，〈聶華苓《桑青與桃紅》七〇年代被副刊腰斬的小說〉，《中央月刊文訊別冊》6期(1997.12)，頁32-33。

應鳳凰，〈聶華苓小說《桑青與桃紅》〉，《印刻文學生活誌》7卷9期(2011.05)，頁190-192。

### 三、報刊文章

〈香港「已發展」乎？「發展中」乎？亞洲紡織月刊〉，《明報月刊》6卷2期(1971.02)，頁5-6。

〈編者的話〉，《明報月刊》5卷11期(1970.11)，頁100。

〈編者的話〉，《明報月刊》5卷12期(1970.12)，頁100。

〈編者的話〉，《明報月刊》6卷1期(1971.01)，頁108。

〈編者的話〉，《明報月刊》6卷2期(1971.02)，頁108。

〈編者的話〉，《明報月刊》6卷7期(1971.07)，頁108。

〈關於桑青與桃紅〉，《聯合報·副刊》，1970.12.01，9版。

〈讀者·作者·編者〉，《明報月刊》6卷9期(1971.09)，頁108。

史誠之，〈歷史轉折與中共的將來——簡論解放軍的過去與中共的未來(十一)結論〉，《明報月刊》5卷11期(1970.11)，頁78-84。

——，〈歷史轉折與中共的將來——簡論解放軍的過去與中共的未來(十二)結論〉，《明報月刊》5卷12期(1970.12)，頁26-30。

司馬桑敦，〈雷震和自由中國半月刊〉，《明報月刊》5卷11期(1970.11)，頁17-

22。

——，〈雷震和自由中國半月刊〉，《明報月刊》5卷12期（1970.12），頁62-69。

——，〈聶華苓在愛荷華〉，《明報月刊》6卷6期（1971.06），頁73。

——，〈蠻漢灘小住（美國航訊）〉，《明報月刊》6卷2期（1971.02），頁26-30。

本刊資料室，〈「釣魚臺列嶼是我們的」〉，《明報月刊》5卷10期（1970.10），頁9-84。

吳湘泉，〈中共醫療制度的變革〉，《明報月刊》6卷7期（1971.07），頁33-39。

李歐梵，〈魯迅的幼年（1881-1896）——「魯迅內傳」的商榷與探討〉，《明報月刊》5卷12期（1970.12），頁5-11。

——，〈魯迅的成年（1898-1917）——「魯迅內傳」的商榷與探討〉，《明報月刊》6卷1期（1971.01），頁53-60。

林克紀錄，〈聶華苓和非洲作家談《桑青與桃紅》（下）〉，《明報月刊》19卷1期（1984.01），頁88-91。

周策縱，〈「五四運動」的定義——「五四運動史」第一章：導言〉，《明報月刊》6卷1期（1971.01），頁6。

姚立民，〈海外中華兒女大結合——美國密西根安娜堡「國是會議」側記〉，《明報月刊》6卷10期（1971.10），頁86-93。

范叔寒，〈失琉球記〉，《明報月刊》6卷8期（1971.08），頁2-9。

康展仁，〈紀念「七·七」——展望保釣行動〉，《明報月刊》6卷7期（1971.07），頁16-18。

張國燾，〈我的回憶（張國燾自傳）〉，《明報月刊》5卷11期（1970.11），頁85-90。

——，〈我的回憶（張國燾自傳）〉，《明報月刊》5卷12期（1970.12），頁85-90。

曹春山，〈香港中文教育患了什麼病？〉，《明報月刊》5卷11期（1971.02），頁58-61。

畢唯才，〈美國華僑青年對中國問題的看法〉，《明報月刊》6卷1期（1971.01），頁61-67。

黃光宇，〈義和團·紅衛兵·彭明敏——美國東西部的華人風波〉，《明報月刊》6卷

2期(1971.02)，頁61-71。

黃愛華，〈七〇年代的中共(五)〉，《明報月刊》5卷11期(1970.11)，頁12-16。

——，〈七〇年代的中共(六)〉，《明報月刊》5卷12期(1970.12)，頁11-15。

溫健騮，〈詩四首：放逐、父親和兒子、我的妻子、神語〉，《明報月刊》5卷10期(1970.10)，頁93。

葉石濤，〈聶華苓的復活〉，《民眾日報》，1986.09.29，11版。

齊平，〈從「聯合」到對簿公庭——「釣魚台運動」與留美學生刊物〉，《明報月刊》6卷10期(1971.10)，頁66-68。

劉達仁，〈香港七·七事件貴在當局〉，《明報月刊》6卷8期(1971.08)，頁10-11。

——，〈中美交往聲中的香港前途〉，《明報月刊》6卷10期(1971.10)，頁5。

蔡炎培，〈扶夢曲〉，《明報月刊》6卷8期(1971.08)，頁83。

盧文亦，〈英國七·七保釣示威〉，《明報月刊》6卷8期(1971.08)，頁12。

盧蒼整理，〈殷海光書簡選〉，《明報月刊》7卷3期(1972.03)，頁35。

戴天，〈1971年所見〉，《明報月刊》6卷8期(1971.08)，頁84-87。

鍾玲玲，〈詩四首：我的燦爛在一九一九、我看見他、假若我死、表弟的來信語〉，《明報月刊》5卷11期(1970.11)，頁98。

聶華苓，〈桑青與桃紅〉，《明報月刊》5卷12期至7卷4期(1970.12～1972.04)。

——，〈桑青與桃紅〉，《聯合報·副刊》，1970.12.01～1971.02.06，9版。

R. David Arkush 著，盧蒼譯，〈憶念殷海光先生〉，《明報月刊》6卷1期(1971.01)，頁17。